



孙思邈雕塑。

百岁老人孙思邈

说起“药王”孙思邈，在古代堪称奇人。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（今陕西耀县），关于他的出生年份，有说是西魏大统七年（541），也有说是隋文帝开皇元年（581）。如果是前者，那孙思邈于唐高宗永淳元年（682）去世时，他已是142岁高寿；即便是后者，也已是102岁高龄了。在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年代，孙思邈的长寿无疑是罕见的。

据记载，孙思邈“幼遭风冷，屡造医门，汤药之资，罄尽家产”，这大概是他后来选择从医的重要原因。幼时，孙思邈天资聪明，嗜学如渴，他7岁就能背诵千字长文，一时被乡里誉为“圣童”。成年后，孙思邈立志研习医学，“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”。

隋朝前后，由于国事纷乱，孙思邈虽然屡次被召，但他都“固辞不受”，一心只想致力医学。在此期间，孙思邈隐居太白山中，他一方面苦心钻研医术，另一方面又亲自采集药草、验证各种民间药方，同时又热心为人治病，由此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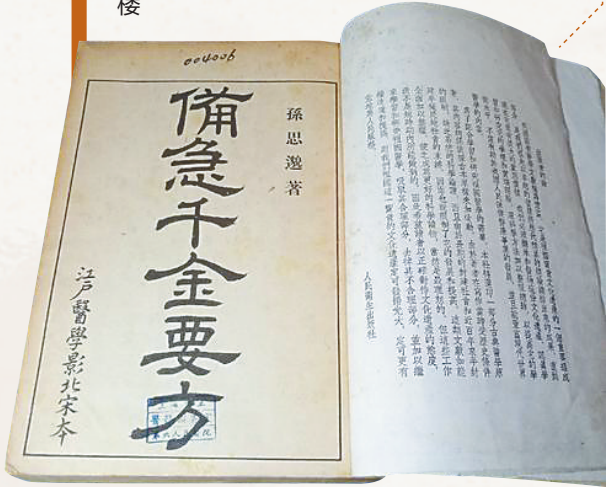
唐太宗即位后，孙思邈应召入京。当时，他已经70多岁，但气色、体态如同年轻人一般。唐太宗见后十分感叹，称他是“有道之人”。唐高宗显庆四年（659），孙思邈再次被接到长安并拜谏议大夫，他虽然留京而仍不愿为官，只是将弟子刘神威推荐进了太医院。在此期间，京城名士宋令文、孟洗、卢照邻等人都以师长事之。

唐高宗上元元年（674），孙思邈因年高有病而恳请放归故里。之后，他回到华原县五台山继续著述。临终时，孙思邈特别交代不要厚葬，“不藏明器，祭去牲牢”。为了感激他多年来看病治人的恩德，乡民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“药王山”，并专门刻碑纪念。时至今日，山上仍保留了很多关于孙思邈的古迹，如“药王庙”“千金宝要碑”“洗药池”等。

孙思邈与《千金方》
治病求德 医者仁心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

中国古代医学源远流长，从战国时期的《黄帝内经》到东汉末年的《伤寒论》，再到明朝的《本草纲目》，隋唐时期的《千金要方》无疑是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。《千金要方》又称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方》，是“药王”孙思邈所著，它也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。



《千金方》书影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《千金要方》成就高

清代医学家徐大椿曾在《医学源流论》中评价历代医家和医书：张仲景治病、论病完全根据《黄帝内经》，所用药方都是古代圣人相传，所用药物也都根据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毫无假借。但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就不同，他综合了《黄帝内经》及之后医学家的学说，所用方剂和药品也是博采众长、不拘一格，其中既有一病多方，也有多病一方，这是“医道之一大变”，其“用意之奇，用药之功，亦自成一家，有不可磨灭之处”。

《千金要方》的主体内容是分科分类论述，其中包括中药学、方剂学、诊断学、伤寒、温病、内科杂病、外科学、妇产科学、儿科学等。在编排上，孙思邈将《妇人方》和《少小婴孺方》置于全书之首，这开创了男女平等之先河，也强调了对妇幼保健的重视。此外，《千金要方》将杂病之方以“五脏六腑”为纲进行分类，这是对《黄帝内经》脏腑学说的发展，也有助于对疾病的系统认识。

在用药方面，孙思邈也十分重视。他对此前的药学成就和民间药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，对中药材的栽培、采摘、贮存、炮制及汤、酒、丸、膏等十余种剂型的制作方法都有详尽的阐述。早年时期，孙思邈到陕西汉中、秦岭、大巴山、太白山等地采过药材，而且亲自种过中草药，书中也大量记载了他的用药经历和体会。以此而言，孙思邈实不愧“药王”称谓。

在方剂方面，《千金要方》共收录4500余条，其中既有来自前人的，也有孙思邈本人及同时代医家的，其他如民间的单方验方，也多有收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首创“复方”概念并加以实践，以增强治疗效果。此外，孙思邈还创下多个“第一”，如用楮树皮煎汤煮粥治疗脚气病、用雄黄治疗疟疾等。

《千金要方》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，对日本和朝鲜的汉医也影响很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元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《千金要方》共刊印了62次，仅次于《黄帝内经》。当然，孙思邈提倡的“医者仁心”“普救生灵”的精神，才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深思的。

医者治病先求德

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成书于唐高宗永徽三年（652），大约用了近30年的时间写成。之所以取名《千金要方》，是因为孙思邈认为人的生命贵于千金，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，价值更胜于此，故以此为名。

《千金要方》共30卷，分233门，合方论5300条，全书约53万字。全书第一卷为总论，主要论述医德、本草、制药等；之后分列临床各科，计妇科2卷，儿科1卷，五官科1卷，内科15卷（其中10卷按脏腑分述），外科3卷；另有解毒急救2卷，食治养生2卷，脉学1卷及针灸2卷。

在《千金要方》首卷中，孙思邈以“大医精诚”为篇名，论述了从医者的医德医风问题。在他看来，从医者应牢牢把握“精、诚”二字，所谓“精”就是医技深湛，所谓“诚”就是医德高尚。他认为，好的医生应“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，如有求医求救者，“不得问其贵贱贫富”“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”。

“大医精诚”的医德学说是儒家“仁者爱人”的具体化，而《千金要方》中奠定的医学道德体系，也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医德法典的渊源。此外，他对疾病认识和行医立意也很高明。在《诊候》篇中，孙思邈就提出，“古之善为医者，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”“上医听声，中医察色，下医诊脉”。对于人的身体状况，孙思邈分为“未病”“欲病”“已病”三种形态，由此提出“上医医未病之病，中医医欲病之病，下医医已病之病”，这点和神医扁鹊的看法十分类似。